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 民间济贫

张佳生◎著

Poverty and Informal Poor
Relief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 民间济贫

张佳生◎著

Poverty and Informal Poor

Relief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张佳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61-0480-4

I. ①十… II. ①张…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英国—
16 世纪 IV. ①F156. 1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5800 号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 张佳生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mslxx123@sina.com)

特约编辑 李永斌

责任校对 单远举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4572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湘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本书受湘潭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05QDB10)

本书获湖南省第十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立项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2)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10)
第三节 理论基础	(22)
第一章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民间济贫	(31)
第一节 中世纪欧洲民间济贫的动力	(31)
第二节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民间济贫	(42)
第二章 十六世纪英国贫困问题的加剧	(52)
第一节 贫困问题加剧的原因	(52)
第二节 十六世纪英国的贫困程度	(83)
第三节 贫困的个案——以伦敦为例	(102)
第三章 英国十六世纪民间济贫的内外背景	(109)
第一节 十六世纪欧洲普遍的贫困化与民间济贫	(109)
第二节 十六世纪英国的济贫立法	(125)
第三节 诺里奇的济贫立法与实践	(136)
第四章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的保持和变动	(143)
第一节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动力的延续	(143)

第二节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形式的变化·····	(155)
第三节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的新特征·····	(164)
第五章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的勃兴·····	(170)
第一节	政府的干预与民间济贫的勃兴·····	(170)
第二节	民间济贫承担的主体·····	(176)
第三节	城市中的民间济贫——以伦敦商人為例·····	(196)
结语 ·····		(200)
第一节	十六世纪英国民间济贫的历史推动作用·····	(200)
第二节	十六世纪中英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比较·····	(205)
附录 I ·····		(211)
附录 II	1598 年英国济贫法 ·····	(212)
附录 III	诺里奇济贫令 ·····	(217)
参考文献 ·····		(221)
后 记 ·····		(236)

前 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失业与贫困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遇到的社会问题。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近代意义上失业、贫困和流民等现象的国家，但它最早通过济贫法和济贫税有效地解决了令政府和人们恐惧的贫困问题。与此同时，英国民间济贫也出现了变化和转变。因此，本著作主要就 16 世纪英国的贫困问题与民间济贫进行研究。在对主题进行论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主题的相关概念做些说明。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本前言主要就贫困概念的界定、本主题的提出及其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第一节是就贫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笔者主要对多种贫困的度量方法进行介绍，做到在本主题概念的运用上度量适中，而不走绝对或宽泛之义，立意也才能准确。毕竟，过与不及的使用概念都不符合过去和现代人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即便一个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第二节主要就学者对 16 世纪英国贫困问题和民间济贫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然后提出自己的论述主题。其目的在于说明自己研究的基础与意义所在，因为先前国内外学者对 16 世纪英国民间济贫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存在着不足。当然它们也包括对贫困相关问题的研究。第三节是就民间济贫的研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使人们认识民间济贫在近代之初发挥社会作用的必然性。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才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跟，否则我们的论述就只是空穴来风。再则，历史事件的背后往往也隐藏着某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理论，这些规律和理论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也因此成为我们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有效工具。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就人类历史而言, 贫困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过去社会, 贫困问题总是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身边, 它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 威胁着一些人的生存, 因此也考验着社会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品质。因为在良好的社会条件下, 他们大多能有物品维持自己, 但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 他们很少能够生产和消费足够的物品来抵抗住变化。无论东西方各个历史时期, 人们都对贫困问题和穷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关注。既包括近世以来世界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立法, 也包括古已有的民间济贫。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 这种态度不仅影响着历史的性质, 也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因为这种态度如人类对待财富的态度一样重要。贫困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就存在, 它的出现及其相关后果一直为历史学家所探悉, 有的是相关的, 有的是直接的。但在对这些研究论述进行认识之前, 笔者首先得对贫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把握。

贫困的概念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语义界定, 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学术事情。早在 16 世纪, 西班牙杰出作家琼·美第纳 (Juan de Medina) 就曾说过, “人们的贫困有许多种, 我们不能用一种方式去界定它们。因为随着时间与风俗变化而需要不同的界定。这也正如所有政府的其他事物一样”。^① 虽然对贫困本身有不同的界定, 但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应有大致的内涵。现在学界主要有两种方法的界定: 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与他人的财富相比有较大的不足, 这是不平等状况的贫困定义, 叫相对贫困 (Relative Poverty)。^② 目前发达国家多存在这一状况。只要人类未消除不平等的分配制度, 它就会在世界的较大范围内存在。从微观来看, 一般相对贫困, 就是针对中等家庭而言的贫困。但如果比较对象不同, 贫困的内涵就是不同的, 这种相对贫困状况应该说没有实际的应用价

① 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②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988, pp. 2—3.

值。因此，著名的英国中世纪史学者克里斯托夫·戴尔曾指出，“穷人，不是在经济术语的界定，而是在政治和法律术语的界定：他们缺乏力量。他们可能包括‘穷骑士’和‘穷教士’，他们比同伙人的收入低，对维持自己的地位有困难，但又在贫穷之上。穷人仅是社会场景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他们接受同情，但不给社会带来麻烦”。^① 这里他实际上给了相对贫困以区分，即与他人相比较而言的贫困。所谓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就是濒临死亡的边缘，濒临死亡是以饥饿状态来界定的。今日有些亚非拉国家多存在这一状况。在 20 世纪初英国贫困研究学者 B. S·朗特里那里，绝对贫困被称为生理危机。按照朗特里的界定，它是指危及“获得为维持生理的最低必需品”的状况。^② 这种状况饥荒时候较多，在人类过去生产力不发达时代，许多家庭都会不时遭遇这种不幸。但“这儿没有布思和朗特里尝试的任何确切的贫困线度量。可以有把握地说，思想丰富的伊丽莎白时代所指的穷人是收入不够供养自己或他们家庭，甚至没有工作的这些人”。^③ 这是习惯上所说的贫困。就绝对贫困而言，有些以死亡率来看待，这就绝对化了。因为饥饿状态并非死亡。“也许，饥饿并不应实际上意味着食物的缺乏，而是吃穿很差，住简陋的茅舍，相当的悲惨。”^④ 对于 P. V. 苏卡特美用热量与蛋白质来衡量人们的身体需求和贫困的水平，美国饥荒研究学者 A. B. 阿普尔比指出，“在对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饥荒研究中，关于热量需求的信息是很少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在饥馑与饥荒年头人们正常热量摄入可能是多少或是怎样的下降”。^⑤ 因此，绝对贫困的这种度量状况应该说也没有实际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原则或文化之间是难以适用到前工业时代的欧洲的，因为不仅缺乏社

① Christopher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200–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5.

②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9—24 页。

③ D. M. Palliser,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 New York: Longman, 1983, p. 119.

④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122.

⑤ Andrew B. Appleby, *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4.

会经济生活许多方面的数量信息，而且一个相应的历史比较标准也是难以选择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两种度量方法都有自身的不足，又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本著作的贫困概念则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虽然贫困不单是贫穷，而且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度量，但笔者更主要是从营养不良和生活水平的降低角度来理解。不过，朗特里认为身体不充分营养的贫困有不同的类别。一些人是因为没有劳动等得来的生活品而身体不充分营养贫困，这是一种第一性贫困（the Primary Poverty）。但也有人因为自己家庭不适当使用收入，将之花在不必需甚至浪费性支出上（如啤酒、赌博等）而形成身体不充分营养贫困，这就是第二性贫困（the Secondary Poverty）。后者有时还占穷人阶层的三分之二。^① 本主题论述的贫困主要是第一性贫困，清教的移风易俗运动则力图消除第二性贫困。

当然从宏观角度来看，对相对贫困的度量也是不同的，因为参照系数不一样，这里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界定。一种是针对历史上他国贫困问题来说，另一种是针对现代非洲贫困问题来说的。保罗·斯拉克就是这样理解近代早期英国的贫困问题的，他称，“值得强调的是，近代早期英国遭受贫困的程度要比许多其他社会轻，当饥荒发生时，它也远没有14世纪以及今天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那样严重。人口情势对比表明，17世纪后期法国的农民比我们这一时期英国的雇佣工人和茅舍农更接近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② 关于今天非洲一些国家的饥饿状态我们现在虽是可以度量的，但由于地区与时间的不同，贫困的标准就难以断定。对于16、17世纪英国、法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比较，我们更是无从考究。因此，斯拉克对贫困的认识并不完全在理。

学界对贫困界定一般有两种度量，有历史的，有现实的。就现今贫困的界定，目前在世界流行的是恩格尔系数。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1875年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所发明的一种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等级。它是指衣食在生活资料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高就越贫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或贫穷程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用恩格尔

^①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 3.

^② Ibid., p. 53.

系数规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就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49% 为小康，20%—39% 为富裕，低于 20% 为绝对富裕。^① 但由于收入弹性、消费结构、收入构成和食品消费的加工程度等，这一贫困界定在世界经济中遭遇失灵。目前这一概念主要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它是不适用的。就总体来说，任何贫困线的划分都是现代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现代客观数字化经济现象的标尺，这是无法适用于现代以前的社会的。

历史学界对贫困概念的界定其实也极不相同，有很多种。W. G. 霍斯金斯是采取财产登记来界定。他将年收入 1 镑或动产少于 1 镑的财产都登记为“nil”（意即几乎“一无所有”），此即为贫困。根据他估计，“在 16 世纪 20 年代，足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非常接近贫困线”。^② 此时英国人口数量少，可谓劳工较为幸福的时代。但此时财物为“nil”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一标准也是不广泛适用。因此，霍斯金斯的贫困评定是放大了贫困量。这里的“nil”并非指真正一无所有，只是财产不多而被估产的人忽略不计，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却是完全自在地生活着。可以说，免税层次不是客观经济地位的客观检测，而是时人观念的记录。因此我们不要将极度贫困这类情感化的词语用到所有那些当同他们更富有的邻居相比，可以被理所当然地称之为穷人的人身上。查尔斯·菲西安—亚当斯对考文垂“nil”家庭进行了考察，发现一些“nil”家还养有家仆，因此霍斯金斯的贫困评定是不足信的，而菲西安—亚当斯认为此时英国的穷人家庭只有 20%。^③ 这一估计还比较合理，毕竟 16 世纪前期英国民众虽然因为圈地运动而财物减少，但相对来说，自耕农在整个社会中数目应该不占少数。

在 17 世纪，由于有炉灶税（hearth tax）和济贫税的征收，因此有学者凭炉灶税来界定贫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是依据家庭炉灶数量来征

^① 李钢：《恩格尔系数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与现象剖析》，《统计与决策》2007 年第 9 期，第 66 页。

^② W. G. Hoskins, *The Age of Plunder: The England of Henry VIII, 1500—1547*, London: Longman, 1979, p. 99.

^③ 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 Coventry and the Urban 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32—134.

取济贫税的。炉灶税在17世纪末被广泛征收,但炉灶多并不说明家庭富有,因为影响炉灶多寡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一些家庭没有牲畜喂养,炉灶就少;况且有些家庭虽被免掉炉灶税,但他们还被要求缴纳济贫税,因此不能说他贫穷。但对16世纪来说,上述这种贫困的度量是不能适用的。因为济贫税虽在16世纪的英国被征收,但一般仅在严重饥荒时节征取,时断时续,且多向富商、富裕农民和行会师傅等征取。如在1596年,贝德福德郡施林顿有164人为教堂缴纳了一般教区税,但仅63名更富有的人支付了济贫税。^①能支付一般教区税就应该表明这些家庭不贫穷,这里度量差距因此很大。

17世纪末英国时论家格列高利·金“1688年英国各类家庭收入和支出估算表”也成为学者们贫困划分的根据。在他的社会分层中,支出大于收入的为“使王国财富减少的家庭”,支出小于收入的为“使王国财富增加的家庭”。^②实际上这为贫困下了一种社会定义:前者贫困,后者富有。根据划分,此时前者在英国有近85万家,后者有50万多家。不过,此时英国的穷人比85万家还少。虽然工资收入不高,但如果他节省开支,他家庭收入还是大于支出的,这就不能说他富有。反之,对富人奢侈也一样。这一贫穷划分因此也存在极大的不足。

公正地说来,对贫困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是很困难的。同时,贫困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为形成贫困状态的原因多种多样。在丰收之年,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还缺衣少食,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状。对个人来说,有些人处于贫困是由于自己主观懒惰,因为他等着社会同情对其救助。因此,这里笔者要采用的贫困概念是一个依据时代特征作出的一个界定,但又不能完全进行定义,所以也就只能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大而化之地进行适中的界定了,毕竟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我们所要说的贫困,是指出于客观原因,人们所遭遇的一种生活困境状态。它们或是缺衣少食,或是居所破旧,一般是家无存余,在困难时期就只能挣扎着过活。

① Marjorie K. McIntosh, Local response to the poor in late medieval and Tudor Eng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Vol. 3, (2) 1988, p. 233.

②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p. 32.

贫困是以穷人形式来表现的，穷人也有各种表现类别，也有多种划分。按其流动性，穷人可分为定居性穷人（the Settled Poor）和流动式穷人（the Vagrant Poor）。一般认为贫困问题的加剧会使后者增多，其实前者也会增多。同时，定居性穷人也会流动的。如 1580 年代，沃里克 50% 的穷人在 5 年里消失，虽有部分死亡，但大部分已移居他地了。^① 人口流动性包括生存性流动和改善性流动两种。一般流动式穷人首先表现为求生存移民增加，并因此形成流民潮和流民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穷人主要为孩童、结婚前后的青年人和老年人。这里又以女性和病痛者为多，女性又以寡母者居多。对穷人分类，也有道德含义性。“从近代早期的管理者和社会改革者立场来看，穷人更似乎分为两类：值得穷人和不值得穷人，这依赖于他们是否成为环境的受害者或他们现在自身可怜的条件。” 16 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威廉·哈里逊就将穷人分为三类，无劳动能力者、伤残者和浪费者。每类下面又有三种。如前者就包括孤儿、盲人、瘸子和长期病人等类别。^② 另外，贫困也可以依据形成原因分为三类：事故性穷人、结构性穷人和主观性穷人。前两者值得同情，后者令人憎恶。但主观性穷人有些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就总体来说，贫困就是生计危机。生计危机有如下四个特征：（1）谷物收成不足造成谷物价格飙升；（2）贫困家庭死于饥饿性疾病；（3）每年死亡人数是平常 2—3 倍；（4）很多人推迟结婚和避免生孩子。这些特征主要发生在饥荒年代，但一般时节贫困家庭就少得多。

贫困问题的形成一直是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内容。1902 年，著名英国贫困问题学者朗特里提出周期理论和六项致困成因：（1）家庭养家糊口之人的死亡；（2）家庭中养家糊口者因意外事故、疾病或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3）养家糊口者失业；（4）工作不稳定；（5）家庭人口数量过多；（6）工资低。当然历史上形成贫困的具体原因比这复杂得多。在进入近代的欧洲，贫困实际上与市场作用关系很大。人们的贫困有三方面原因：（1）不同行业与企业就业者工资水平的差距；（2）低工资就业

^① A. L. Beier,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83, p. 5.

^② 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0—11.

状况；(3) 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失衡。^① 这些是贫困的成因，但造成贫困还有其他诸多因素。

民间济贫是相对于官方济贫而言的，但它出现的历史较官方济贫早。官方济贫主要是济贫法的颁布，一般被称为 poor law，实际上就是正式济贫 (Formal Poor Relief，可以简称为 Formal Relief)，或者称为强制性济贫；民间济贫就是非正式济贫 (Informal Poor Relief，可以简称为 Informal Relief)，是一种自愿性济贫。这一概念由社会学非正式支持一词演变而来的，非正式支持是相对于正式支持而言的。因为正式支持一般意指官方的社会推动行为，有文告、法令和指令等。

在历史学研究中，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主要涉及社会控制。因为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新的市场经济观念萌生滋长，竞争意识和牟利精神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社会流动空前加速，社会财富的显著增长与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并行不悖，社会控制与社会稳定迫在眉睫。在近代英国，从 16 世纪都铎时代到 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颁布的济贫法试图以官方和制度形式规范社会秩序，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安身立命的低度保障，避免社会的急剧动荡。“这几个世纪中，英国国家从只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到更加急切清除这一新生产方式的社会障碍，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一帮助以济贫形式进行，这种支持类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标志。”^② 正式支持是官方的态度、决策和实践，而非正式支持则是民间层面的积极支持。非正式支持依据社会资源利用分为家庭式和社会式。前者包括对亲属与仆徒的支持，后者包括对邻里与陌生人的支持。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中，英国社会因为有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作用而度过了 16—17 世纪的普遍危机。关于社会史非正式支持研究，本—阿莫斯曾使用过。这里非正式支持包括互换礼物、家庭亲属关系、仆徒关系、款待、慈善和借贷。^③ 民间济贫是非正式支持的

① 刘继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核心争论》，《国外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第 64 页。

② Larry 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 and Poor Relief in England 1500—1860,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78.

③ Ilana Krausman Ben-Amos, Gifts and Favors: Informal Suppor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2, No. 2, (June) 2000.

重要内容，但非正式，或民间济贫概念在历史学中使用时间不长。约翰·沃尔特在1989年《近代早期英国饥荒的社会经济》一文中较早使用。但关于这一主题内容的深入研究则最早是W. K. 乔丹对近代早期英国慈善史的研究，A. L. 贝耶尔在1983年《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贫困问题》的书册中则仅将之作为非官方慈善（Unofficial Charity）重要部分来论述。这里，他是将其与官方济贫（State Poor Relief）相对应，^① 不过所述太为简略。

民间济贫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福利制度安排，主要功能是为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而提供社会认可的最低生活保障，它包括随意性和制度性安排。民间济贫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最能体现特定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最能说明主导性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观察与分析特定社会处境下福利制度安排特征的基本视角。在过去时代，它主要有宗教、救济、经济和调节四大职能。^② 即便因为这些，历史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不多，主要是缺乏资料和历史理论。民间济贫是英国济贫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16世纪以前，没有政府的济贫法和济贫税，人们通过教会和邻里关系进行救助。虽然16世纪以后欧洲社会有济贫法，但它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民间济贫力量。“邻里间民间济贫和互助大多是看不见的，因此一直缺少研究。但它在城市和乡村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 尤其在城市里，由于缺乏当地亲戚，人们往往易于求助于邻里、雇主、朋友和其他当地网络的帮助。就英国而言，“如果济贫税和教区安置是英国济贫的两个支柱，那么施舍坊、学徒基金，或年金资助等慈善捐赠是第三个支柱，它们往往带上成立者的名字”。^④ 一般来说，近代早期征取的济贫税救助只覆盖到总人口的4%，而另外未得救助的穷人就得更多依靠民间济贫了。

① A. L. Beier,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pp. 19—23.

② 刘继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核心争论》，第60页。

③ 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96.

④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 11.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15—16 世纪是西方世界走向近代的开端，过去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转变的积极因素研究较多，尤其是英国。如重商航海、纺织业转变和议会政治等研究内容，在这里笔者就不进行赘述和一一列举了。但伴随这一伟大转变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犯罪问题和家庭问题等。不过西欧各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也就相应地因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而迥异。由于英国长期被我们视为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顺利过渡的较为典型的国家，国内外学者对 16—18 世纪英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进行了积极的关注。这里政府的努力包括济贫法、粮食控制政策和款待运动等。但在英国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除了政府的立法正式支持外，还有民间济贫。“清楚的是，创建性努力和多数资金，更多地来自私人捐赠，并非立法构想的机制。”^① 因此，我们除了对都铎政府的济贫法、粮食控制政策和款待运动等正式支持考察外，对 16 世纪英国的民间济贫进行考察因此也就相应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但从济贫问题本身来对 16 世纪英国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时间并不长。从国家层面的分析上，有从福利国家角度，也有从宪政角度来论述的；从民间层面的分析上，早期有从民间慈善角度，新近有从公共福利角度来探讨的。前人的研究成果都为本著作所进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 16 世纪英国民间济贫的关注又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因此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是很有必要的。通过这种分析，笔者提出本著作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一些学术推进工作。

16 世纪是欧洲人口开始不断增长的阶段，其人口总数接近黑死病前的水平。在农业生产率尚无较大幅度地提高的情况下，贫困问题已成为一个泛欧洲现象。由贫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出增长的势头。

^① W. K. Jordan, *Philanthropy in England, 1480—1660: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nglish Social Aspira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59, p. 18.

1994年出版的德国历史学者罗伯特·于特（Robert Jütte）的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贫困问题与失范行为》对这一泛欧洲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不但穷人数量在增长，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走上了不轨之路。“在那时，这个社会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传统的慈善机构不能再应付像潮水般涌来需要救济的人们。穷人在数量上的增长和在性质上的变化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中世纪旧式的救济方式。”^①在人际本能的互助加强的同时，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自16世纪开始，政府对穷人不得不进行集中式的控制，因此欧洲的济贫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社会是政府机构在主导着福利部门，而“现代福利国家赢得的这一发展始自于16世纪，当与穷人的个人联系渐渐消失时，由法规规定的更疏远的关系破坏着道德和宗教的因素，并慢慢地取代了它”。^②英国也不能游离于欧洲这一历史潮流之外。自16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对贫困问题进行了不断的关注和集中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英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并使之成为现代世界典型的福利国家。

较早对16世纪英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不是从福利国家的形成这一角度来考察的，而是基于对法律史的研究。16世纪英国贫困问题的产生与欧洲经济社会现实的变化是同步的，并有着本国许多更特殊的变化，因此在贫困的程度上，英国是严重于大陆诸国。因此在济贫的研究中，对英国的研究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社会救济的角度来对16世纪英国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不过较早的著述是对政府济贫法的研究。对济贫法的关注是由“宪政史派”开始的，代表作有E. M. 伦纳德《英国早期济贫史》一书。该著作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的议会、地方政府和枢密院三类官方机构对贫困问题消解的参与。三者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期对英国贫困问题解决的主导作用是有变化的，地方市镇进行早期的实验，议会将一些可行性的方法进行立法，枢密院的任务是对济贫法的规定予以推行。政府济贫的真正实现是枢密院与治

① 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2.

② Ibid., p. 199.